

# 江南四重奏:从梦江南、文学江南 到地理江南、文化江南

施建平

(苏州职业大学 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 江苏 苏州 215104)

[摘要] 江南的涵义非常丰富,从唐代开始,似乎生活于江南成为人生的梦想。然而早在春秋时期,“江南”并非指“长江之南”,其在史书上的所指也比较泛化。《史记》中始把“江南”的概念确定下来——即长江之南。晋室南迁后,江南的生产力逐渐发展起来。“江南”的文学意象才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尤其是《江南曲》在南北朝时期的传唱,使“文学江南”的概念得以确立。而到了唐代,江南的行政区划逐步细化,从江南道到江南东道,政府对江南的治理也逐渐重视,“江南”的地理概念与“江东”逐渐接近。而到了五代时期,由于北方战乱、衣冠南渡,直接带来了以南唐(杨吴)、吴越国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的繁荣,成为人民向往的乐土,成就了“文化的江南”。

[关键词] 梦江南;文学江南;地理江南;文化江南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5-0079-07

## 一、梦中的江南及“梦江南”的 由来及演绎

提起江南,人们不免要联想到南朝民歌《江南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想起梁朝丘迟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想起唐代诗人皇甫松的“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联想到韦庄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甚至联想到秦观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这是文学意象中的江南,更是人们梦中的江南。但江南作为“梦”的意象,究竟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呢?这可能与唐代开始流行的词曲有关。

因为“梦江南”一词早在中唐时期就已经以词牌名出现了,它相当于唐代的流行歌曲的名称;不过这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据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云:

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望江南》——笔

者注),亦曰《梦江南》。

中唐名相李德裕仕途坎坷,被贬任浙西观察使时,与一位名叫谢秋娘歌妓相好,遂为其赎身置宅。无奈红颜薄命,年仅二十三岁就早逝了。李德裕伤心不已,为悼念她而作此曲,初为《谢秋娘》,一曲二十七字,可惜词作的内容已不传。该曲传入教坊后,乐工非常喜欢此曲调,但词牌名显然比较狭隘,不宜修改内容加以推广,遂改为《望江南》,又名《梦江南》。白居易也曾填写过此曲,作《忆江南》一首、《江南好》两首。但《谢秋娘》故事的发生地在润州(今江苏镇江),而白居易所回忆的则是杭州和苏州。可见,他们的“江南梦”有所不同。与李德裕同时代的张祜也有一首《梦江南》:行吟洞庭句,不见洞庭人。尽日碧江梦,江南红树春。(《万首唐人绝句》卷十六)。可惜调子和白居易一样,太明亮了些。

温庭筠的名作《望江南·梳洗罢》倒能体现出《谢秋娘》原作的一丝哀怨之情: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而五代南唐后主李煜的《忆江南·多少恨》则

[收稿日期] 2019-06-16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点专题研究项目“‘文化自信’语境下江苏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维度与策略”(2017ZDXTXM029);苏州市职业大学创新项目“吴文化在高校育人中的理论维度与实践案例”(SVU2016YY0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2018ZDJD-B018)。

[作者简介] 施建平(1973—),男,江苏常州人,编审,研究方向为文化对外传播。

在“江南梦”中流下了亡国的泪水：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该词的色彩又过于灰暗了，但“江南梦”逐渐流传开来。

此后，“江南”成了诗意栖居之所，梦中的乐土。宋代的贺铸、元代的仇远等，都作过《梦江南》的词曲。到了明代，“梦江南”已不是文人的专利了，武将们也做起了此梦：“闸头尘土污征衫，……石田茅屋梦江南”。

而现实中，江南的点点吴山，江南的如天碧水，江南的绵绵丝竹，江南的琴棋书画、江南的私家园林……莫不让人流连忘返。当“江南”一词徜徉迷离、波光粼粼地闪烁在我们面前时，有时我们还真分不清哪些是意象，哪些是可以触摸的真实。从地理概念的变化、从历史层累的角度去看，我们可以将思绪的触角伸得更长一些。

## 二、地理的江南：

### 从抽象到具体，从泛指到专指

翻开历史的典籍，我们发现，在春秋时期，人们对“江南”的认识还是比较粗浅和抽象的；从《左传》记载来看，“江南”既可能指汉江之南，也有可能指“淮水之南”。因此，“江南”在先秦是一个泛指的概念。

有人认为先秦时期的“江南”指今长江中下游以南，即今天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sup>[1]</sup>此说颇令人怀疑。《左传》中提到的“江南”有三处，如“（昭公三年）十月，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sup>[2]1612</sup>“（昭公）四年春王正月，楚子……止郑伯复田江南。”<sup>[2]1615</sup>“（宣公十二年）此年春，楚君攻陷郑都，郑伯肉袒牵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sup>[2]793</sup>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肉袒牵羊，以迎楚师”（公元前597年）的故事。从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sup>[3]29-30</sup>等文献来看，这里的江南即云梦泽，在汉江两岸。所以《左传》中所说的“江南”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长江之南”。

另外，从当时郑伯与楚王打猎的地点来看，应该是两国边界或者离郑国并不是太遥远的地方。当时的郑国以新郑（今河南省新郑）为国都，国界大致为：东到如今的开封、兰考，南达今许昌、禹州，西到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北越黄河，境内有汝水、颍河、沙水等河流。而楚国当时的范围大致是在汉水及长江以南的地区，主要以湖北和安徽为主，长江下游属于吴国和越国，湖南一部分属于

扬越。<sup>[3]24-25</sup>。因此，《左传》中的“江南”，可以作理解为“汉江以南”。另外，也有可能理解为“淮水以南”。如“（昭公十三年春），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唐代孔颖达注释为：此江南豫章为长江北淮水南。因此，春秋时的“江南”并不是“长江之南”。

《楚辞·招魂》中有“魂兮归来哀江南”之句。汉代王逸注释为：言魂魄当急来归，江南土地僻远，山林险阻，诚可哀伤不足处也。他对“江南”的范围言之未详。历代以来，学者争讼不已，但大多认为“江南”应该指楚国的荆州到沅江、湘江这一带，有时汉北等也包括在内。

自两汉起，“江南”一词的所指，也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从地域上看，其范围似有所扩大——从《史记》中相关描述，可以看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西到今天的贵州一带，南到南岭。<sup>[4]</sup>“江南”一词在《史记》出现有70多次，下面仅举三例：

（尧）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史记·卷一）<sup>[5]70</sup>

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史记·卷二）<sup>[5]141</sup>

白起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卷五）<sup>[5]456</sup>

在汉代人的概念中，江南地域已经十分宽广。

因此，我们应该用动态发展的观点来解释：“江南”的概念并非十分固定，在汉代就有变化。《史记》中使用的“江南”一词，大多数并不确指某一具体地域。其含义相对模糊，有时仅是“长江以南”的含义。东汉时期，江南的所指范围有所扩大。《后汉书》卷十四：‘信遂将兵平定江南，据豫章。’卷十七：‘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或遣子将兵助彭征伐。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可见此时江南范围已包括荆州及长江以南的数郡，甚至还包括了交州的苍梧、交趾等郡。到了东汉末年，江南的范围由原来的长江中上游的南部，逐渐转变为专指长江中下游的南部。”<sup>[6]</sup>

在东汉末年，由于士大夫南迁及孙吴政权对长江下游的开发，江南由“蛮荒”“瘴湿”之地，逐渐向丰饶之地转变，江南的概念已变成了“长江下游的南方地区”，大致范围是孙吴统治地区。保存于《宋

书·乐志》的《相和曲》的歌词《江南可采莲》为后人描绘了一幅当时的汉人初到南方时“惊艳”的图画，宛如西部歌王王洛宾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后，发现遍地是唱歌能手：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首汉乐府形式的歌词，应该是创作于汉代。他们忽略了这两个因素：一是汉乐府只是一种乐曲的形式，并不是说这种乐曲只能用于汉代，汉代以后的三国、南北朝也在用。二是汉末大乱，衣冠南渡，这些汉朝的子民，用汉乐府的曲子把江南采莲的情形记录下来，也是完全可能的。换言之，假如真的产生于汉朝时期，远在长安这个半干旱气候区的帝王将相们，怎么会相信那土地低湿、瘴疠盛行、人多早亡的蛮夷之地——江南，会有荷叶之绿、莲花之艳、采莲女之绰约风姿呢？要知道，直到三国时期，曹植的笔下，“江南”尚是一块充满想像、有待开发的蛮荒之地。在汉人的诗词中，汧河、泾水、渭河、黄河，才是他们歌颂咏叹的对象。因此，笔者认为，把《江南曲》断为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为妥（张鹏认为其可能最早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sup>①</sup>。至于这些民间小调在江南传唱了多少年才记录于史册？尚需考证。

### 三、文学江南的历时构建

由此可知，“江南”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概念：一是地理概念，从广义上讲，秦汉以后长江以南的地区，都可称为“江南”。二是文学意象，为东晋及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墨客们所构建，最迟在南朝的刘宋时期就已产生了，以《江南曲》为标志。三是社会概念，即汉末人口南迁，以及孙吴政权的建立，对于长江下游特别是苏浙一带的开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由此在五代时期，以南唐（前身为杨吴）<sup>②</sup>和吴越国为主体的“文化江南”已基本形成。

一般认为，东晋时期，南下士子创作的大量诗词，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对“江南”文学概念的构建，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孙绰的《兰亭诗》《游天台山赋》，谢灵运的“山水诗”。谢灵运至今流传的名句有：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

从石室山到庐山，再到雁荡山，从“七里瀨”到“江中孤屿”，再到“池上楼”。这绵绵不绝的美景，让他感到“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直到西汉，江南还处于“火耕水耨”“地广人稀”的落后状态，气候和地理环境恶劣，文化并不发达。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在江南大地传唱千年的戏曲《马前泼水》，尽管男主人公朱买臣（吴郡人）手不释卷，相信总有一天会发达，但还是妻子还是离他而去。这说明了当时的江南一带，并没有诗书传家的氛围。而耕读传家，是需要相当的物质基础的。换言之，从读书人之少，可见当地经济之欠发达程度！司马迁的《史记》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状况：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sup>[5]7601-7602</sup>

上述文字表明，即使在学富五车、踏遍大半个神州的司马迁眼里，“江南”还是一种遥远的想象，楚、越两词往往是一起连用的；而长江、淮河也是一种含混的概念。由此可见，“江南”无论作为一种地理概念，还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体的概念，都尚未构建。因而，《江南曲》传唱于西汉时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到了东汉以后，江南的气候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经济发展迅速，循吏教化使中原礼教风俗广泛传播。尤其是晋室的南迁，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发展，江南在文化上逐渐取得和北方相抗衡的地位。因而《江南曲》在民间传唱的物质基础才逐渐具备。“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的描绘，对“江南”文学意象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此，从南朝时期开始，“江南”慢慢演化成了一个文学概念。除了东晋的孙绰、谢灵运外，柳恽、沈约、谢朓等人拟作的“江南曲”对江南文学意象的构建也功不可没。

柳恽的《江南曲·相和歌辞一》

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归客，

<sup>①</sup> 张鹏对传统的观点——《江南可采莲》是汉代作品（以沈约、萧涤非等人为代表）提出质疑，他认为三国曹魏时期曹植等人搜集整理的。笔者与张的观点有所不同，认为《江南可采莲》，主要传唱于东晋南朝时期。因该观点与本文的主要议题关联度不大，故不在此展开论述。

<sup>②</sup> 当需要说明杨吴、南唐之间的延续性时，下文统一写作“南唐（杨吴）”或“杨吴（南唐）”。

潇湘逢故人。

故人何不返，春华复应晚。不道新知乐，祇言行路远。

柳恽(yùn)，对于今天的读者可能有点陌生，但在南朝时的文坛，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柳恽，山西运城人，梁朝著名诗人、音乐家、棋手，朝廷上下，拥有粉丝无数。

沈约(441—513)，这位协助梁武帝的重要开国功臣，《宋书》的主要撰写者，门阀士族的后代，对于他自己的家乡，当然更是充满了热情，因为他就是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与上文提到的丘迟(吴兴乌程人，今浙江湖州人)可以称得上是老乡了。

#### 江南曲

棹歌发江潭，采莲渡湘南。宜须闲隐处，舟浦予自谕。

罗衣织成带，堕马碧玉簪。但令舟楫渡，宁计路嵌嵌。

曾任江州府刺史(政府驻地九江，管辖如今的大半个江西)幕府的刘缓其所作的《江南可采莲·相和歌辞》描绘更是细腻婉约：

古《江南》辞曰“江南可采莲”，因以为题云。

春初北岸涸，夏月南湖通。卷荷舒欲倚，芙蓉生即红。

棹小宜回迳，船轻好入丛。钁光逐影乱，衣香随逆风。

江南少许地，年年情不穷。

类似的诗作，不胜枚举。这为隋唐后诗人对江南的歌咏奠定了基础。比如，数百年后李贺甚至作一首《和柳恽》的诗：“汀洲白蘋草，柳恽乘马归。江头桕树香，岸上蝴蝶飞。酒杯箬叶露，玉轸蜀桐虚。朱楼通水陌，沙暖一双鱼。”<sup>①</sup>

进入唐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又一次的衣冠南渡，江南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文人墨客们的关于江南的诗就更多了。人们所熟知的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李珣的《南乡子·乘彩舫》：

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带香游女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

这些传诵一时的关于江南的名篇，流传海内外，并浸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并对周边的日

本、韩国、朝鲜、越南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曾经担任过两年的杭州刺史，治水有方，西湖的疏浚，功不可没，留下了著名的白堤；后来他又担任苏州刺史，对阊门到虎丘的“七里山塘”的治理也有口皆碑，其像入苏州五百贤祠；因此，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白居易治理过的江浙名城“苏、杭”便成了江南的代表和象征。

## 四、文化的江南：

### 江南的所指立体化，概念基本定型

五代末年，江南的所指，无论其地理概念，还是行政区划，都已大大缩小。张剑光在《唐五代江南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把江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域，进行了详细地阐释：从江南道(长江以南岭南以北的广大地区为江南道)到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范围大大缩小了。而江南东道后来一分为三：浙江西道、浙江东道及福建道。江南的地理范围进一步缩小，与如今人们认为的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概念有所接近。为行文方便，现以南唐(杨吴)和吴越国政权为江南地区的代表进行阐述。笔者认为：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出版教育等兴盛，造就了文化的江南。

#### (一)文化江南的内涵之一：社会安宁

胡族出身的安禄山一记马鞭，打断了所谓的“开元盛世”的进程。随着皇族的南逃蜀中、中原士族的南迁，读书人的南渡……中原文化的在江南、蜀地等得到了传播和复兴。中原地区向南迁徙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支由荆州等地渡过长江向南，一支由扬州等地渡江向南。

江南等地能成为乱世中难得的一片乐土，是因为杨吴(南唐)与吴越国虽然也有争战，但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因而社会环境相对安宁。唐末时杨吴和钱氏政权的斗争史，流传于民间则成了一件件“趣事”。如杨行密常命人用粗绳把钱一贯贯地穿起来，称之“穿钱眼”；钱氏政权也号召百姓用大斧砍杨柳树，称之“斫杨头”。天复四年(904)，杨行密与钱氏停战，互遣战俘、通婚和好。后来，实力较强的南唐其实也有过兼并他国的机会。但是杨吴的继任者、南唐的开国君王徐知诰(后改名李昇)并不这么认为，他从小在寺庙流浪，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爱好和平。当吴越国发生天灾时，他并没有乘机发动军事进攻，反而予以粮食支援，帮助邻国度过难关。吴越国的创立者钱镠，虽然是草根

<sup>①</sup> 上述诗歌，参见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M]，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16—319。

出身,但也爱好和平,喜欢结交儒佛道人士,很少主动发起战争。这也是江南地区得以安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宋代马令在史书中的称赞这一太平盛世:

“群臣咸谓江淮之地,频年丰稔,兵食既足,士乐为用,天意人心,未厌唐德。”(《马氏南唐书·卷一》)

由此看来,马令等人认为南唐是大唐王祚的庚续,只不过士人和生产方式从中原转移到了江南而已。北宋初年人们对安定社会的渴望,早在五代的江南社会就已经实现了。

太祖皇帝既定天下,鲁之学者始稍稍自奋,白袍举子大裾长绅杂出戎马介士之间,父老见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

因此,可以说社会的安宁是“文化江南”得以确立的政治基础。

## (二)文化江南的内涵之二:经济的发展

江南的文化兴盛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南唐(杨吴)和吴越国都在发展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其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南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兴修水利。南唐在丹阳疏浚练湖(今江苏丹阳县城西北),在南京东面的句容疏浚绛岩湖,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市)筑白水塘,在寿州(今天安徽寿县)筑安丰塘,灌溉了不少良田。南唐还利用疏浚的淤泥修筑圩田,解决了因河床较高、田地较低而导致的洪涝问题。圩田是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发明,为江南一带成为鱼米之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是税赋的管理趋于精细化,制定了合理的赋税制度和便民措施。如歙州(今天安徽歙县)人汪台符提出,按照民田、物畜等条件的高下,制定上、中、下三种不同的征税标准。尤其是提倡让百姓用余粮换盐巴的“盐米”制度,让百姓在交粮的时候顺便把盐也换回来,非常方便。三是奖励耕织,每人垦田80亩,赏钱2万文,5年不抽税;3年栽桑3000棵,赐帛50匹……<sup>[7]365-366</sup>

吴越国地区濒临东海,饱受水患灾害,其因而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修筑海塘和疏浚内湖上,高筑杭州城以及营建仓房等基础设施上。据考证,钱镠多次修筑海塘。后梁开平四年(910年),钱镠动用了大批劳力,修筑钱塘江沿岸的海防石塘(用木桩把装满石块的巨大竹笼固定在江边,形成坚固的海堤,保护了江边农田不再受潮水侵蚀)。此外,钱镠还在太湖地区设都水营使以主水利之事,“撩浅军”又称“撩清军”,约有七八千人,专

门负责疏浚湖泊、筑牢堤岸,使得苏州、嘉兴等地得享灌溉之利。<sup>[8]56-57</sup>

南唐吴越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百姓虽然谈不上安居乐业,但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能混个温饱也知足了。当时的一首民谣《没了(liǎo)期》反映了当时的民生状况。前半段是百姓的牢骚:

没了期,没了期,营基才了又仓基。

讲的是当时的徭役非常繁重。执政者听了之后,把它改编了一下:

没了期,没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sup>[7]217</sup>

意思是,不论兴修水利还是造营房、建粮仓,都是温饱之本。在这样的战乱年代,只有未雨绸缪,才能安居乐业。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谈不上小康,但这与北方动辄“屠城”“食人”的政局相比,已经称得上是乐土了。

## (三)文化江南的内涵之三:文化的兴盛

江南地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使文化江南这一概念的构建成为可能。它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人文荟萃、教育兴盛、科举的延续和出版事业发达。

### 1. 人文荟萃

唐末的士大夫相当一大部分流落到了江南,因为南唐则是江南地区面积最广、经济实力较为强盛的“十国”之一。且地处淮扬要津,交通方便。投奔南唐(杨吴)的北方人士有韩熙载、常梦锡、马仁裕、王彦铸、高越、高远、江文蔚等。因此,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质量上来说,南唐的人才都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到了南唐中主时期,士人群体渐成气候。而南唐后主时期更是人才辈出:

“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马令《马氏南唐书·卷十三》)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还有冯延巳、李璟、李煜等。冯延巳(903—960),一作冯延己、冯延嗣,广陵人,在政治上比较平庸,与陈觉等人被称为“五鬼”;但长于文学,尤擅词曲,在描摹儿女情长的同时,能以小喻大,在写风花雪月、感喟世事的无常的同时,展现出对生命的思考、对时政的忧思。如其传诵千古的名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就显得“堂庑特大”,让人联想到政治的变幻莫测。“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以男女喻君臣,读起来缠

绵悱恻,联系到社会现实又让人颇感无奈。对北宋晏殊、欧阳修等人的影响较大。李璟(916—961),南唐中主、文学家,其词仅存四首,意境高远。“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李璟的这首《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仿佛就是一个隐喻,也体现他当时对中华文化深深的忧思——千古文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军事来保护,那一切都将烟消云散,自己统治下的南唐又何尝不是秋天的一叶残荷!李煜(937—978),字重光,号钟隐,李璟第六子,南唐后主,文学家。有人称其为“帝王诗人”。他后期的词作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脍炙人口的词作有《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关于南唐二主词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先贤早有定论,兹不赘述。另外还有名相李建勋,也著作颇丰。今传有《李丞相诗集》。

吴越国朝招贤纳士,不输南唐。钱氏政权在长江南岸设立招贤亭(相当于现在的人才招聘专场)。因此,也有一些人才涌向了吴越国。如皮日休、罗隐、胡岳等名士,皆与钱氏友好,或为其所用。其宰相如曹仲达、沈崧、皮光业等,皆一时之选。诗人贯休在杭州时曾给吴越王钱写诗《献钱尚父》,诗中名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据《十国春秋》载,名士罗隐晚年就归依钱镠,卒于发运使之位。

## 2. 教育兴盛、科举不辍

南唐鼓励教育、科举不辍。昇元二年(938年),南唐在开设太学的同时,还兴办了各级地方官学。

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坟典,特置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马令《南唐书·朱弼传》)

一般认为,位于庐山白鹿洞的庐山国学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校。白鹿洞原为唐代李渤读书处。南唐昇元间,李昇在此建学馆,称为“庐山国学”,由李善道任洞主,成为南唐的儒学教育中心,南唐诗人孟归唐就曾肄业于庐山国学。除了庐山国学之外,五代江西可考的书院还有六所。<sup>[7]368</sup>据相关史料记载:

开宝八年二月,“江南知贡举,户部员外郎伍乔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开贡举,迨于是岁,凡十七榜,放进士及第者九十三人,九经一人”。(李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

## 3. 图书出版业发达

南唐的造纸业等产业比较发达,为其图书出版

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五代时期,唐代最大的商业城市扬州多次遭受兵火,有很多人为了躲避战乱南迁,这就为江南尤其是南唐提供了包括造纸业在内的大量人才。南唐的徽州地区山多林广,盛产纸墨,如制作精美的“澄心堂纸”,与歙砚、徽墨被称为文房四宝中的精品。南唐后主李煜尤其喜爱,称之为“纸中之王”。政府的推动促进了造纸业的生产 and 技术的改进。

南唐文化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其在绘画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流传至今的《宣和画谱》中的袞袞多士,曾云集南唐。例如,外号为“梅家鸡”的梅行思是湖北江夏人,以绘人物、画牛马称绝,而其中最拿手的是画鸡。李煜曾把他招到南唐来。江苏常州人董羽(字仲翔)有口吃的毛病,外号“董哑子”,但擅长绘龙水海鱼事,李煜也非常优待他。《吴越春秋·卷三十一》<sup>[8]53</sup>

五代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绘画方面,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都有较大成就。花鸟画以黄筌、徐熙为代表。今传《柳塘聚禽》是黄筌代表作。人物画以顾闳中为代表。顾闳中,南唐元宗、后主时任待诏,著名画家。今传《韩熙载夜宴图》是其代表作。山水画以荆浩、关同、董源为代表。另外,南唐藏书家也很多,如上文提到的李煜的宠臣张洎,另外还有朱遵度、朱昂等人。朱遵度,原为青州人(今山东青州),后迁居金陵,“家多藏书,周览略遍,当时推为博学,称曰‘朱万卷’”。<sup>[7]371—372</sup>

南唐图书流传至今的不多,原因有两个,一是南迁士族、文人较多,受原来的抄书习惯影响,印刷出版业可能不如吴越国发达。二是很多编著、传抄的图书在李煜国亡时被付之一炬了。流传至今的仅有徐铉注释的《说文》、刘知几的《史通》、徐陵的《玉台新咏》、李建勋的《李丞相诗集》等。不过张秀民先生认为南唐之书尽焚不可信,宋初吕龟祥在金陵收集到2万多卷图书上交京城史馆。但比起南唐后主一次就赏赐宠臣张洎万卷图书,宋朝所收图书数量还是少了点。<sup>[8]49</sup>曹之先生认为,南唐至后主李煜时仅宫中的藏书就有十几万卷。<sup>[7]373</sup>因此,李煜国破焚书,使大量图书绝迹、不传于今是有史为据的。

身处江浙地区的吴越国的佛经类的印刷活动更是经年累月,声势浩大,宗教类图书传播于大江南北,印刷技术享誉海内外。名僧永明延寿939年前后,参与刊刻《弥陀经》,印刷弥陀塔图14万本。975年前后,与钱俶共刊印佛经、咒语、塔图、佛像数十万卷。从民国到现代,不断有考古发现吴越国时

期印刷的物品。吴越国降宋后,杭州直接成为赵宋王朝重要的出版、印刷基地。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江南”为赵宋王朝的佑文抑武的政策,奠定了基础。因此,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杨吴(后唐)、吴越国等南方地区及蜀国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大发展,赵宋王朝是很难取得陈寅恪所称道的辉煌文化成就的。可见,五代时的江南,不仅是经济发达地区,也是文化兴盛之地。宋代文化的兴盛,不如说是保存于江南的文化,又在播及中原大地,在全国更多的地区扎下了根。

从地理的江南,到文学的江南,再到文化的江南,一路走来,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江南梦”是如何演化的。社会安定、政治文明、经济发展,似乎是形成“文化江南”这一概念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也是本文论述“文化江南”诞生于五代时期这一论断的本意之所在。

## [参 考 文 献]

[1] 王青.唐代以前的“江南”在哪里?[J].神州民俗(通俗

版),2011(11):73.

[2] 左丘明.左传[M].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4]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绪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6] 张鹏.乐府古辞《江南》考论[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3.

[7] 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8] 施建平,曹然.五代出版与新闻传播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53.

(责任编辑:闫卫平)

## Jiangnan Quartet: from Jiangnan in Dream, Jiangnan in Literature to Jiangnan Geography and Jiangnan Culture

SHI Jian-ping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Wu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Jiangsu Suzhou 215104)

**Abstract:** Jiangnan is rich in connotation. Living in Jiangnan has been the dream of life since Tang Dynasty. However, as early a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Jiangnan” did not refer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more general reference can be found in history.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the concept of “Jiangnan” was determined for the first time as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fter the South Jin Dynasty moved south, 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literary image of Jiangnan began to appear in literary works, especially in the Song of Jiangnan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hich established the literary image of Jiangnan. In Tang Dynasty,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Jiangnan was further refined, as can be seen in the change from Jiangnan Road to Jiangnan host road. The government also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governance of Jiangnan, and the geographical concept of “Jiangnan” was close to that of “Jiangdong”. In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the gentry migrated to the south because of the war in the north, which resulted in the prosperity of the south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represented by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Yang Wu) and the State of Wu Yueguo. Jiangnan became a land of promise and thus “Jiangnan Culture” was achieved.

**Key words:** Dream for Jiangnan; Jiangnan in literature; Jiangnan geography; Jiangnan culture